

《新亚特兰蒂斯》中的全球叙事

杨时雨

(天津工业大学, 天津市, 300387; wyoliver1998@163.com)

摘要:《新亚特兰蒂斯》表面上并未直接描绘殖民扩张,但其叙事中通过对空间的安排、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制度的呈现,间接展现了一种全球中心的想象。本色列被塑造为理性、自足且节制的理想国度,其对知识的严格控制、对宗教与历史的统一诠释,以及对国家制度的有序展现,共同构成了一个虽未言说“全球”,却具有世界秩序建构意图的叙事模式。本文从空间布局、语言策略与象征符号三方面入手,探讨该文本如何在早期现代语境中,预设一种主导性的世界图景,并为后来的殖民话语提供了叙事框架与参照。

关键词: 弗兰西斯·培根;《新亚特兰蒂斯》;全球叙事

引言

作为一部未竟的哲学寓言,《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 1627)承载着17世纪初英国对于知识、秩序与世界格局的集体想象。它以航海故事开篇,却迅速从奇观式旅行转向对一个融合理性统治、宗教庇护与知识管理的理想国的描绘。文本构造出一个在地理上隐秘、在知识上占据主导地位、在文化上进行选择性接纳的“本色列岛”,不仅体现出对理性制度的一种理想化描写,也反映出一个全球意识初现的国家,如何借助语言、地理与制度性的叙事,为自身在未来世界秩序中预设中心角色。

《新亚特兰蒂斯》中的理想蓝图体现出一种面向外部世界的秩序逻辑:它通过模拟帝国式的知识体系,以“所罗门宫”为权力核心,向外派遣“光之商人”搜集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却极少向外界开放自身知识。这种单向的信息流构成了明显不对等的认知关系。与此同时,文本对航线路径、语言运用、宗教象征与文化包容的描写,构成了一套虽披着平和外衣,实则暗含文明等级观念、排斥文化差异的叙述方式,显现出一种以知识为媒介、温和但排他的文化输出逻辑。正是这种看似非暴力、实则高度选择性的知识输出机制,使本色列在不依赖地理扩张的前提下,构建出一个对全球他者进行定义的象征性结构。

基于以上文本细节,《新亚特兰蒂斯》可被视为早期“全球叙事”的一个重要文本。其内部的空间安排、制度设计与对异域的描写,共同构成了一个在帝国话语尚未完全成型之时,便已显现的理性化文明想象。在后殖民批评与世界文学的视角下重新审读这一文本,有助于揭示文学如何通过秩序与知识的书写介入全球命名权,也映照出殖民意识如何借助科学、宗教与道德的表层包装,为其主导世界的叙事构建合法性。

1. 地图之外的帝国:本色列与全球空间的重构

《新亚特兰蒂斯》(*The New Atlantis*, 1627)文本以一段貌似偶然的海上漂流开篇:船只自秘鲁出发,原计划前往中国和日本,却因“风向不利”[1]未能抵达目的地,最终在神秘力量的引导下抵达本色列岛。这场偏航看似因气候所致,实则暗藏空间等级与文明秩序的设定逻辑。秘鲁作为“新大陆”的出发点,中国与日本则作为静默的东方意象一掠而过,未被深入描写,而本色列则以一个没有明确地理坐标的“神启中心”出现。这种空间设计实际上完成了从现实地理向文明等级的转换,勾画一种普遍有效却未明言的全球空间格局。

这一航线安排不仅重组了地理秩序,也在无形中暗示了一种文明发展的等级划分:秘鲁作为“新大陆”的起点、中国与日本作为未展开叙述的静默他者,皆未被赋予文明对话的主体地位,唯有本色列以“神启中心”的姿态现身,成为被预设的文明终点。本色列的现身被赋予神意象征,叙述者将其比作“约拿离开鱼腹”[1],这段“脱险”的经历被转化为一种文明得救的象征事件。航行因此不再是地理上的探险,而成为预示未来世界秩序的一次文化启示。本色列由此不再只是“一个新地方”,而是被赋予理性与秩序核心意义的象征空间,是未来文明中心的预设。

在这种空间结构中,语言与象征系统发挥着关键作用。外来者初见的羊皮卷上使用了古希伯来语、希腊语和西班牙语三种文字,并配有“小天使”和“十字光环”的图像[1]。这种图文结合不仅赋予“神圣传信”以合法

性，也揭示了文本所推崇的文明价值体系。本色列的使者在外来者尚未开口前便准确使用三语，这种“预知性”的语言调度实际上体现了话语权的先发优势。尽管古希伯来语在地理上源自西亚，在文化上也常被归入“东方”传统，但在文本中，它被纳入西方宗教语系，与希腊哲学语言和西班牙语共同构成一种“神圣语言”的谱系，实现了意义上的“西方化”。

正如Mary Louise Pratt所言：“在殖民语境中，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权力结构的延伸”[2]。语言的选择实际上构成了一场文明筛选：哪些文化有资格发声，哪些语言被赋予真理权威，哪些文明能够进入启示体系，已在这种安排中悄然划界。东方语言的缺席并非疏漏，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排除。如Emily Apter所指出：“在所谓世界语言规范化的过程中，被排除的语言本身就被视为无效的存在”[3]。叙述者所到之地虽然位于东方，但所有象征系统与亚洲书写传统之间却毫无联系，表明文本试图通过语言体系的重组，将地理上的“东方”纳入由西方构建的意义秩序之中。

在《新亚特兰蒂斯》中，本色列被塑造成这样一个主动“现身”的空间：它不是被发现的对象，而是一座在特定语境中，为“尊贵外邦人”而缓缓开启的文明舞台。它的中心地位，不靠争夺或宣告，而是在文本的推进中自然浮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显现”并不是一次纯粹的空间描述。它并非简单地告诉我们本色列在哪里，而是一步步将读者引导进一个被安排好的观看路径。与其说叙述者是在发现一座岛屿，不如说他是在沿着一条设定好的航线，被带入一套既定的文明结构之中。所看到的每一个空间、每一个制度展示环节，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文本精心组织的结果。如果从福柯关于“话语”的理解来看——即语言不仅传递内容，也参与建构知识与权力关系——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这种结构的作用：它不只是展示，而是在展示中设定了文明的位置与顺序。福柯曾指出，现代权力往往不是通过强制显现，而是通过让人处于“被看见”的状态中，悄然完成秩序的内化[4]。在本色列的呈现中，正是这种“被观看”的结构，使其文明主位无需强调，却始终存在。

在这一意义上，本色列的“展示”不仅塑造了认知顺序，更成为制度合法性的观看机制。而Debord在《景观社会》中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中的“展示”行为本身，已构成支配秩序的基本方式[5]，本色列的观看结构正是这种象征性权力的文学转写。本色列的这一“被观看”的结构，并非偶然，而是象征系统在话语层面上的具体表现：通过地图、展示、叙述节奏等一系列符号性安排，它将空间结构转化为意义结构，使其文明中心地位在视觉层面被自然化为“可接受”的秩序原型。这里的“被观看”并不仅仅意味着空间的可视化，它是一种制度话语对感知路径的安排：通过控制“看什么、如何看”，文明等级在观看中悄然成型。

本色列被设定为文明中心，并不是因为文本赋予它宏大的历史背景，而是因为其在空间与语言的组织中，悄然确立了中心的位置。从航线的偏移，到仪式空间的分层展示，再到语体上的中性写作与信息披露的次序安排，读者被一步步引导进入一个已经设计好的观看结构。地图不再只是地理指引，而成为阅读路径的隐喻；语言的节奏也不仅传递知识，更影响着读者理解的方式和顺序。通过这些安排，文明等级的感知不是由叙述者直接指出的，而是在展示过程中自然显现，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本色列的主位地位。

这样的空间安排，也让《新亚特兰蒂斯》与传统的乌托邦作品显得不同。托马斯·莫尔笔下的乌托邦是“无地之地”（no-where），强调其与现实的隔离与超越，而培根设想的本色列则像是一个“被重新命名的所在”——它虽然没有具体的地理位置，却始终在叙述中表现出一种中心感。这种中心地位，不是靠武力或宣言确立的，而是通过制度描写、语言组织、文化展示等多种方式慢慢浮现出来。正如Moylan所说，现代乌托邦越来越倾向于呈现一种“可治理的空间结构”[6]。《新亚特兰蒂斯》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中，通过航线设计、展示节奏与宗教安排，构建出一个文明坐标轴：谁是中心，谁是边缘，由谁来设定，文本在层层推进中给出了答案。这也说明，本色列并不试图征服什么，但它希望被看见、被效仿，它通过看似温和的方式，安排好一个文明理应如何运作的样子。它看上去没有野心，但它展现的一切，都是某种标准的预设。可以说，这是一个“隐而不宣的帝国”：它通过展示制度与规范，悄悄影响着他者的判断。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设想理性制度的作品，不如说它是一个关于“如何让人接受你”的文本实验。它不告诉你该怎么做，却让你在阅读中被一步步引导，最后自觉认同它所呈现的秩序图景。

本色列在《新亚特兰蒂斯》中所呈现的“全球中心”地位，并非仅凭神秘的空间设定，而是通过一整套制度化的话语系统建构而成。文本以一次神启事件为起点，经由“圣书漂流”、“圣人祷告”与“制度确立”之间层层嵌套的叙述逻辑，构建出一个自足、可继承且具备对外辐射能力的理性政体。在这一过程中，空间意象、宗教符号与政治语言共同发挥作用，使本色列不仅成为一个神迹之地，也成为一个具有观念影响力与制度示范意义的文明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本节所分析的制度建构叙事，构成了《新亚特兰蒂斯》全球叙事结构的核心支点：文本不再依靠地理上的扩张，而是通过一套制度机制完成文化影响力的延伸。

本色列的制度合法性，植根于一段由启示引发的历史叙事。书中记载：“小的约柜……这部书包含着所有新旧约经典……”[1]。圣书的“漂流”象征神意的降临，也为国家政治体制的设立赋予了宗教正当性。国王因接收这份“外来启示”，而建立法制与宗教机构，使本色列成为一个“敬天爱道之国”[1]。国家起源被置于神圣文本、神意启示与君权意志的交汇点，绕过了现实权力斗争，确立起一种带有超越性的合法性结构。正如

Paolo Rossi所指出：“在培根笔下，知识从不只是沉思，而是治理的工具（*instrumentum regni*）”[7]。本色列政体的根基，正是知识、信仰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密切融合。

这一制度化的“知识中心”不仅在内部确立，还通过对外交流机制进一步巩固。在描述国家如何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时，文本写道：“我们有十二个人以其他国家的名义……航行到国外，收罗各地的书籍论文与实验模型，我们称他们为‘光之商人’”[1]。这些人被派遣至世界各地，秘密搜集知识成果，却对本色列的情况守口如瓶。知识的获取成为制度的一部分，而对知识的封闭管理则体现了一种非对称的信息结构。这种交流模式一方面实现了对全球资源的低调采集，另一方面也确立了本色列在认知结构上的主导地位——一个看似开放、实则封闭的“认知帝国”。

此外，本色列对待外来者的方式也透露出制度背后的边界意识。文本提及：“我等此地向来有密法……一般不许异邦人进境；虽予以礼貌接待，却不容其随意往来。”[1]。对于漂流者与正式使节的差异化接待，显示出一套空间主权与礼仪秩序的双重划界。表面上的宽容接纳，其实内含文化规训与制度控制的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从神启过渡到制度的叙事结构，并不仅用于内部合法性建构，更是《新亚特兰蒂斯》“全球叙事”想象的关键支点。正是通过这种神圣—理性—秩序之间的叙事联结，本色列的制度获得了一种“可被接受”的权威感，成为外来者眼中具有吸附力与模仿价值的治理模型。因此，它在全球叙事中所占据的核心位置，不是依赖于横向的地理扩张，而是在纵深制度话语的层层铺陈中悄然生成出一种理性范式的引力场。本色列之所以成为叙事核心，恰恰在于它的制度既具封闭性，又具示范性——不仅可自持，而且具有吸附他者的能力，成为一种可以被理解、被模仿、被接受的理性范式。文本中的全球性因此不依赖横向的空间扩展，而是在纵深制度话语的层层铺陈中悄然生成。

作为一个通往知识与秩序的象征空间，本色列并非完全封闭的孤岛，而是一个经由制度筛选与选择性接纳构建而成的“文明高地”——它在文本中并不主动征服，但却始终被设定为外部他者仰望、接触、观看的中心结构。这一外部视角，对他者的分层接纳、受控展示与象征吸纳体现出来的：他者无法进入本色列的内部，却不断被引导去理解其秩序，进而强化了本色列在全球文明叙事中的中心地位。

首先，文本在“外邦人之家”部分通过制度安排对外来者进行分类接纳：“我们接待陌生人极为礼貌，但并不允许他们自由行动”[1]。这种做法保留了乌托邦传统中的“宽容”面貌，但通过空间与行为限制，传递出对文化差异的管理欲望。在后文对“光之商人”的描写中，认知结构的封闭性表现得更为明显：“所获取的知识仅供所罗门宫决策参考，我们从不向外泄露我们的知识”[1]。这意味着他者可以被观察、被理解，但却无权进入知识体系内部，也无从发声。叙事权与认知权完全归属于本地中心。

其次，在涉及其他文明的描写中，文本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判断。对美洲原住民的描述是“习俗野蛮、丧失理性”，对中国的评价则是“闭关自守”、“愚昧懦弱”；而类似的自我封闭行为却在本色列这里被解释为“出于仁义之考虑”[1]。这一语义的双重标准揭示了文明等级体系的内建逻辑：本色列拥有自我解释的权力，而他者则只能在被他者化的叙述中被界定。正如Edward Said指出的，东方并非以真实形象出现，而是被构造出来以服务西方自我认同的镜像他者[8]。

再次，文本中对宗教异族的处理，也提供了解构“多元包容”神话的视角。例如，岛上虽允许少数犹太人信奉摩西律法，但他们必须接受本色列救世主“如天上之光”的观念[1]。这并非真正的信仰自由，而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归顺。他们可以保持身份，但必须承认本色列的文明优越性。这种“以包容之名行同化之实”的机制，正是殖民话语中常见的文化吸纳方式。正如Pratt所言：“帝国话语的根基在于对他者的节制性容许，而非平等的共处”。

不仅如此，所见之中的象征表达也进一步规定了“谁有资格代表国家”。文本在描写“元老”与“所罗门宫祭司”时，强调他们“仪容雍容华贵”、“服饰庄重整齐”；而“葡萄藤之子”只能由男性继承，这象征着力量与荣耀，女性被排除在象征链与继承体系之外。这种阶层与性别的象征安排，构成了文本中谁能“被看见”、谁能“说话”的文化设定。

总的来说，从偏航设定到空间象征，再到制度安排与话语结构，《新亚特兰蒂斯》通过一整套叙事机制建构出一个层级分明、中心明确的文明想象图式。文本最初借由看似偶然的地理偏航，引导叙事者避开东方国家与新大陆，最终抵达“神启中心”本色列岛，完成了从地理位移到文明分层的隐喻转换。随后的制度设计、知识控制与文化礼仪进一步巩固了其“象征中心”的文明形象。在这一象征系统中，世界被划分为中心与边缘，本色列不仅是政治与知识的起点，也被设定为唯一拥有命名、分类与观看权力的主位者。这种全球叙事并不依赖实际的空间扩张，而是通过象征机制与制度语言的持续强化，完成了对世界结构的预设性编排。在“开放”与“欢迎”的表象之下，文本深藏着一套隐性的文明地图划分逻辑，定义了谁有权进入、谁必须沉默。这一结构，正是现代帝国话语中最隐蔽、也最持久的权力组织方式。

2. 叙事策略与秩序话语机制

若说空间结构与制度设定为《新亚特兰蒂斯》提供了文明构型的外部框架，那么语言策略则构成了文本内部秩序运行的深层组织方式。本文所称“语言策略”，并非仅指修辞技巧或文体风格，而是指文本如何通过语体风格选择、信息呈现方式与叙述节奏，构建出一种看似中立、实则高度规训的知识话语秩序。正如Bronwen Price所指出的，培根式文本中常以“非个体化的语言结构”隐藏其权力运行机制，通过语体上的中性与去情感化，将秩序自然化为理性的一部分[9]。

《新亚特兰蒂斯》即以一位匿名旅行者叙述者，全篇缺乏冲突与情绪起伏，语气平稳、结构整齐，语体更接近航海日志或编年体。尤其在对所罗门宫的描写中，叙述者采用密集的术语分类与功能分工语式，将制度组织转译为“知识描述”，形成一种理性中立的语体幻象。正是在这种话语组织中，文本完成了对权力秩序的隐性编码，使治理逻辑被包装为科学陈述，服从逻辑被误认作求知行为。全篇没有剧烈的冲突推动，也缺乏人物性格的深入描写，而是借助一位匿名旅行者的平静叙述展开，采用类似航海日志、编年体的笔法，有效掩盖了文本中潜藏的权力结构。尤其在对所罗门宫的描述中，叙述者从建筑外观、人员配置到研究内容与实验分工，一一列举，语言整齐、结构清晰，大量使用列表与分类的语式，如“我们有三十二人，分为十种职能”、“我们称这类人为‘提问者’”等，营造出一种理性有序、客观中立的叙事氛围。但正是这种“条理清晰”的叙述方式，掩盖了其中深刻的权力逻辑，构建出一个“知识即治理”的场景。正如柯福所论，现代权力往往通过“规训性知识语言”运作，将分工与术语作为治理工具，使服从制度看似是追求知识的自然延伸。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文本频繁提及各种“自然奇观”与“超常实验”，如“天堂之水”，叙述者的语气却始终克制、平淡，几乎没有情绪波动或惊奇赞叹。这种“语调与内容的错位”，反而强化了一种冷静而理性的叙述姿态，使文本呈现出高度节制的风格。正如Bronwen Price所指出，培根式文本中那种去个体化的语体，是赋予知识话语正当性的关键装置[8]。叙述者的“退场”，意味着其声音被文本所吸收，个体经验让位于理性秩序的生成。

这种理性的语体风格，为文本的全球性提供了独特的叙事支撑。它削弱了文本的地域性与文化特殊性，使本色列的制度经验看起来既普遍适用，又可被复制。“我们有这样一类人……”“我们的制度由以下部分组成……”这类表述方式并不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而是通过通用化的语言，将本地制度包装为可供全球效仿的范式模型。McKnight指出，《新亚特兰蒂斯》并不试图描述现实世界的运行逻辑，而是“构建了一座预演未来治理模式的舞台”[9]。文本正是借由这种去地域化、去情感化的语体，将具体经验转化为普遍模板，完成了知识向全球输出的第一步。

本色列被设定为文明中心，并不是因为文本赋予它宏大的历史叙述，而是因为其在空间与语言的组织中，悄然确立了中心的位置。从航线的偏移，到仪式空间的分层展示，再到语体上的克制写作与信息披露的次序安排，读者被一步步引导进入一个已经设计好的观看结构。地图不再只是地理指引，而成为阅读路径的隐喻；语言的节奏也不仅传递知识，更影响着读者理解的方式和顺序。通过这些安排，文明等级的感知不是由叙述者直接指出的，而是在展示过程中自然显现，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本色列的主位地位。

文本并不急于揭示所有制度或真理，而是通过结构上的“信息披露的‘延宕’机制，让本色列始终处于“尚未完全显现”的状态。例如，在初至外邦人家时，接引者便强调：“你们将渐次知晓一切，但不必急于探问”。知识的传达被设定为一个有节奏的过程，信息不再只是被动呈现，而是作为叙事权力的一部分被控制。特别是在描述所罗门宫时，文本采用“部分揭示”的结构：接引人提醒，“你们所见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关键的内容将于未来揭晓。即便最终进入内部空间，旅行者看到的也只是经过筛选的讲述与陈列，关于制度运行机制、技术原理与社会影响的核心问题依然保持沉默。这种“展示而不解释”“命名而不说明”的策略，让知识既显现权威，又保留神秘与未来性。

这种叙事节奏，不仅是文学技巧，更是一种文化政治策略。正如Gaukroger所说，培根的知识论不在于“立刻揭示真理”，而在于“设计通向真理的路径与制度结构”[10]。在《新亚特兰蒂斯》中，知识不是终点，而是一种组织力量；不是作为结果被揭示，而是作为秩序的中介被编排。这种延宕性的结构安排，使文本自身成为一个“尚未完成”的文明蓝图，全球性也正是在未来的制度想象中悄然构建。

与此同时，这种延宕结构也对“他者”的存在进行了结构性悬置。文本从未真正展现外部世界如何回应本色列，而是通过旅行者视角、选择性描述与语境控制，建构出一种单向度的认知关系：是本色列在观察世界，而非世界在对话本色列。正如Franco Moretti所言，世界文学并不总是互动结构，更常是一种“中心预设未来秩序”的构图方式[11]。

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布局下，本色列作为全球秩序设计者的地位得以确立：它不是现在的主导者，而是未来的中心；不是现实的帝国，但却是思想的源点。这种通过“延宕”组织全球话语的结构，使得本色列在不必出征、不需征服的前提下，实现了对未来世界的潜在统摄。

在《新亚特兰蒂斯》中，叙述者始终保持一种克制、去个性化的语言风格。他不作评价，也几乎不表露个人情感，仅以一种平稳的语调描述所遇所见。这种写法让整部文本显得冷静、干净，不似参与讨论，更像是在记录既定事实。制度设计、科技实践乃至社会结构，也都以类似的方式被逐步呈现出来，看上去似乎无需辩护，就能成立。

与这种语言风格一致的，是文本对信息展开方式的有序性。本色列的制度并不是在读者面前一次性铺开，而是通过空间与话语节奏的层层推进逐步显现。叙述者从最外围的“外邦人之家”进入，之后才进入“所罗门宫”、试验空间与图书馆，所看到的内容也依照这种空间层级依次展开。每一环节都像是一次被引导的“观看”——既不能跳过，也无法逆转。这种安排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难主动构建全貌，只能随着叙述的节奏逐步理解本色列的制度图景。

语体的非情绪化处理与信息的节奏控制，共同构成了一种特定的观看方式。读者所“看到”的，并非全部信息，而是被安排过的内容序列。观看在此已不再意味着自由观察，而是成为一种由文本设定、观者顺从的理解过程。通过设定“看什么”与“怎么看”，文本塑造出一套不依赖直接宣告、却能有效传递文明结构的展示策略，使本色列的秩序与价值判断在无形中被接受，而非经由辩论而建立。

所罗门宫不只是一个科学机构，更是一个“知识剧场”：实验工具陈列整齐，人员分工明确，讲解人庄重陈词，而旅行者只能默默观看。其情绪反应也被文本设定为“敬佩”、“赞叹”、“由衷感叹”，不再是自由感受，而是文明认同的一种被设计结果。正如Kendrick所言，培根并非构建一个知识共同体，而是塑造一个“观看共同体”——一个通过观看而认同的秩序结构[12]。

在这种逻辑中，权力不再显现为命令，而是隐含在“可被观看”的安排之中。整个文本围绕“让你看我”展开，通过控制观看路径、节奏与语境，引导读者步步深入文明的中心，进而完成权力的自然化。正如福柯所言，现代治理逻辑不靠惩罚维系，而是通过被观看而实现秩序的内化。《新亚特兰蒂斯》以所罗门宫为视觉核心，通过一层层观看设计，使读者完成了从他者到认同者的心理转化。

更关键的是，这种“观看机制”并非封闭于文本之内，而具有强烈的象征外溢性。但这一观看模式并非自然生成，而是由文本内部三重语言策略——中立化的语体风格、延迟与筛选式的信息披露方式，以及缺乏情绪波动的叙事节奏——共同构建而成的。这三种叙述机制协同作用，营造出一种表面平静、结构清晰的知识叙事语境，使文本所呈现的制度与文明不以论证或辩护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被展示”的客观存在方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语言策略并非直接传递意义，而是构建出一种知识可视化与制度展示的结构，它引导读者不是去“理解”或“评价”，而是去观看、接受与模仿。这一“知识展示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被安排的观看路径：从“外邦人之家”到“所罗门宫”，再到图书室、实验室与祭坛空间，叙事者被引导完成一场逐层深入的文明感知过程。读者也在这一路径中被带入，一步步接近一个“理性秩序如何运作”的完整图景。这种展示构建出可供效仿的原型，使得“旅行者的观看”转化为“读者的认同”，本色列也由此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全球范式。如Apter指出：“凡是可被世界观看的结构，往往也被预设为可被世界学习的结构”。本色列不再仅是理想之地，而成为全球文明地图中最具代表性的认知坐标。

可以说，这种观看机制重塑了全球秩序的象征权力：它无需征服，也无需输出，仅凭展示自身，便暗中地完成了文明话语的构图。这正是《新亚特兰蒂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它从不高调地宣称自己是中心，但整个叙事却早已安排好了一条观看的路径、一套感知的节奏。读者在阅读中被潜移默化地引导，走进一个关于“理性、秩序与未来”的想象剧场，而本色列，就在这个剧场中缓缓浮现为世界的主角。

从空间设定的偏航策略，到语体中克制而中性的表达方式，再到展示机制所设定的阅读顺序，《新亚特兰蒂斯》所建构的并非一个发号施令的文明权力中心，而是一个从话语内部“说服”世界的认知焦点。它所实现的全球性，不靠边界的拓展，而靠意义的预设、语言的节奏与象征的层层嵌套。

3. 理性中心的扩散与全球认知秩序

在《新亚特兰蒂斯》中，理性岛屿的空间设定与叙事节奏固然确立了其作为文明中心的象征地位，但更深层的全球叙事机制，则来自超越地理与制度的意义扩散：通过对知识结构的重构、对宗教与历史的重新编排，以及对他者形象与文明等级的持续建构，文本塑造出一个“未言殖民，先建话语”的象征性世界秩序。本色列的全球性不在于跨越疆界，而在于其将自身经验设定为未来秩序的唯一正当参照，使“世界”尚未抵达，便已落入其叙事逻辑之中。这种通过神启与知识主权双重机制实现的认知统摄，是文本最隐蔽却最具现实投射力的政治构想。

在这部作品中，知识既不是开放共享的资源，也非平等交流的机制，而是一种高度组织、向内集中、对外封闭的认知结构。本色列的正当性并非基于疆域扩张或技术优势，而在于其对知识的单向掌控：从全球各地采集信息，却拒绝公开本国制度与学问，从而形成一条由外流入、由中心统摄的认知通道。更重要的是，这种知识的单向流动不仅构成技术层面的信息组织方式，更逐渐演化为文明象征系统的基础：只有本色列拥有解释世界、筛选知识、组织真理的权力，而他者则始终处于被归纳、被理解、被命名的位置。正如福柯所

强调的，“知识既是权力的工具，也是其运作方式”，谁掌握知识的组织与展示权，谁就掌握了世界的命名权与秩序制定权。因此，知识不仅是制度内部运行的工具，也成为本色列对外投射文明等级的象征符号资源。在这一结构中，认知的中心化与象征权威的确立是同步发生的。本色列之所以能在全球叙事中占据核心位置，不仅在于其知识控制能力本身，更在于其通过知识制度所确立的文明形象——它不言说扩张，却通过信息的控制与展示，完成了对世界意义的主导。

“光之商人”制度正体现了这种逻辑：“我们派出使者前往世界各地，但从不泄露我们国家的制度与知识”，这类叙述明确划定了知识的单向流动与本地的解释权归属。这一制度不仅未被视为排他，反而被叙述者赞誉为“仁政与理性的表现”。文本中对这种非对称结构毫无质疑，反而充满敬意，进一步突显了文本如何将“节制”包装为文明伦理，将权力结构自然化。

在结构层面，这种安排使本色列掌握了对“世界知识”的解释权。它以采集代替交流，界定何种知识可被记录、吸纳与保存。Stephen Gaukroger指出：“培根式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其组织、分发与排他管理能力”。所罗门宫象征的，正是一种结构严密、只纳不出的治理模式，不仅统摄知识，也重塑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逻辑。

这一知识主权的行使，与殖民意识的“认知殖民”密切相关。文本通过提取他者知识、转化为理性资源、再重新命名与整合，构建出一个封闭却充满吸附力的文明架构。本地制度与知识拒绝外泄，不仅表现为技术层面的信息封闭，更构成一种象征性权威的建构机制：正是因为不可进入、不可复制，本色列的秩序才获得了神圣性、优越性与未来感。在这种知识体制中，全球不再是一个平等互通的多元空间，而被重构为一个由中心采集、归类、展示的认知舞台。他者不再是自我命名的主体，而是被本色列定义、过滤、展示的对象性存在；本色列的知识掌控转化为一种文明等级的象征逻辑，其制度因此不仅运作于政治结构之中，也以象征符号的形式深刻嵌入全球叙事之中。本色列的知识制度正是通过类似的机制，将其对世界的认知权包装为理性的自然结果，使其中心地位不仅是政治设定，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当然如此”。知识在此不仅是治理资源，更是文明想象的象征资本；“不可见的知识”与“可见的展示路径”构成了权力与观看的双重结构。本色列由此确立了自身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唯一正当位置：不再扩张，不需征服，却通过话语与象征完成了全球意义结构的布局。

培根在《新亚特兰蒂斯》中借助神启祷告、圣书漂流与制度确立之间的象征性链条，将政体的建立包裹于宗教奇迹与文明召唤之中，使其看似源于天命、而非建构，从而构成一种“不可置疑”的秩序起点。Tom Moylan指出：“乌托邦文学常借神迹构建制度合法性的深层隐喻”。通过这一象征机制，本色列政体获得了一种“被选中之地”的象征身份，其制度因此脱离现实政治偶然性，而成为可以向外输出、具有普遍引力的理性模板。对宗教他者的“宽容”也是这套合法性叙述的一部分。文本允许犹太人继续信奉摩西律法，但前提是他们承认本地救世主的至高恩典，并参与本地宗教节庆。这种“包容”本质上是一种象征性吸纳——他者的合法性需依附于本地权威之下，构成一种文化上的重新命名与整合。如萨义德所言：“殖民话语的包容，常是一种通过仪式性让渡实现的文化净化过程。”

历史叙述中亦显现出等级结构。与其他文明的接触被简化为“我们早已超越他们”的总结，而对美洲原住民的描述则直接归为“愚昧、不近理性”。在这套文明谱系中，本色列被推至“后启示文明”的顶点，而他者则沦为“等待教化”的对象。历史不再是经验回顾，而是一种秩序编排手段。

最终，这种将宗教与历史整合进合法性叙述的策略，为本色列的全球角色赋予了象征资本：它既古老又先进，既神圣又理性，既代表传统又预设未来。这种象征资本并非孤立生成，而是象征符号系统长期运作的产物——而是在空间布局、语言策略与象征机制的长期协同作用下积累而成的象征性成果，本色列逐步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中心的文化权威与象征效力。全球秩序由此不再依赖扩张，而是经由话语机制、象征框架与知识结构提前完成。正如Louis Marin所说：“乌托邦文本重绘的不是空间地图，而是合法性结构 [13]。”

在这个意义上，《新亚特兰蒂斯》是一部看似平静却在结构上持续外溢的全球话语文本。它不宣称中心地位，却在观看机制、知识节奏与象征操作中完成中心建构。它不依赖征服，却组织出一整套文明秩序的标准化路径。在表面理性与温和之下，文本深藏着文化主权、认知等级与象征统治的结构逻辑，使其成为现代殖民意识形态的先声。

4. 结论

回顾全文可见，《新亚特兰蒂斯》通过空间布局、语言策略与象征符号机制的协同构造，完成了一套隐蔽却高效的全球话语建构工程。地理上的偏航设置使本色列超越现实世界坐标，成为象征意义上的文明中心；语言层面则通过中性语体、延迟披露与展示结构，设定了知识如何被观看、如何塑造认知秩序；而象征机制更借助神启叙事、宗教吸纳与等级构型，将制度正当性自然化为文化共识。这三种路径交汇于本色列的“非扩张式统摄”之中，使其无需殖民征服，便通过意义控制、观看机制与话语正当性，完成了对全球秩序的象征性预设。在这一意义上，《新亚特兰蒂斯》不仅是一部理性制度的寓言构想，更是现代文明中心话语

的一次文学预先划分。其对空间、语言与象征的精准组织，也使我们得以在今天重新思考：全球性的形成，究竟源自事实的交换，还是意义的安排？

通过这部短小却深远的寓言，培根将其经验主义的知识理想转化为一套系统性的文明叙事框架，使理性不再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而成为构建全球秩序与文明等级的象征资源。在这一话语结构中，知识即是正当性，展示即是权力，中心即是秩序的命名者——本色列所代表的象征范式，为后来的文明优越论、殖民合法性与话语中心主义提供了文本背书。

当代全球化重新回到争议的中心位置，重读这部理性帝国的原型构想，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新亚特兰蒂斯》提醒我们：所谓全球性，从来不是一个中立的概念，它始终处于叙述、结构与象征的巧妙安排之中。而文学，正是这种编排最早发生、最隐秘展开、也最值得反思的文化空间。

参考文献

- [1] BACON, FRANCIS. *The New Atlantis; and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M]. Whitefish, Mont: Kessinger Publishing, 2005.
- [2]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03.
- [3] APTER, EMILY. *Against World Litera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anslatability* [M]. London: Verso Books, 2013.
- [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1977.
- [5] 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M]. New York: Zone Books, 1995.
- [6] MOYLAN, TOM. *The Concept of Utopia* [M]. Bern: Peter Lang, 2011.
- [7]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8] PRICE, BRONWEN. Introduction [A] // Bronwen Price, ed. *Francis Bacon's New Atlanti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C].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4.
- [9] MCKNIGHT, STEPHEN A. *The Religious Foundations of Francis Bacon's Thought*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5.
- [10] GAUKROGER, STEPHEN. *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Thought*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M]. London: Verso Books, 2003.
- [12] KENDRICK, WALTER. Imperial Laboratory: Discovering the New World in Bacon's New Atlantis [J]. *ELH*, 2003, 70(1): 199–220.
- [13] MARIN, LOUIS. *Utopics: The Semiological Play of Textual Spaces* [M]. London: Macmillan, 1984.